

祛魅后的作家自觉

——从张欣的《不在梅边在柳边》谈起

钱旭初

(江苏广播电视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36)

摘要:在文化场域世俗化背景下,在创作中自觉将人文精神和通俗化笔法弥合具有的十分重要的意义。长篇小说《不在梅边在柳边》中,表现了当下知识分子身份迷失的世俗化困境与精神撕裂的悲剧性存在,同时作者张欣在小说中,充分使用通俗化元素的知识谱系,深入探究现代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探究人与人之间复仇与掠夺的悲剧性存在,较好地寻找到了将文学叙事的通俗笔法与作家精英立场之间的对接,将原本叙事的对立转化为了依存和共赢。

关键词:张欣;《不在梅边在柳边》;通俗叙事;知识分子;精神危机

中图分类号: I 05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3)01-0045-05

A Novelist's Self-awareness after Disenchantment

——A study with A Love Story of Plum and Willow by Zhangxin

QIAN Xu-chu

(Jiangsu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6, China)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ress human spirit in a popularized manner when creating a novel, especially in a secularized literary world. When reading A Love Story of Plum and Willow, we notice a secularized dilemma in which intellectuals lose their identity and a tragic existence in which they tear up their spirit. By means of introducing popularized factors, the novel gives insight into the spiritual crisis of modern people and also the revenge and robs between them. It set a good example for compromising between popularized narration and novelist's elite point of view, and hence turning opposition into reliance and cooperation.

Key words: Zhang Xin; A Love Story of Plum and Willow; popularized narration; intellectuals; spiritual crisis

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将人与世界联系的意义体系通过他特有的言语方式加以呈现。在这个过程中,小说家本人的意识、经验、想象、认知,以

及他的意识形态、文化判断、审美态度,悄然隐藏在文本背后,文本言说方式成就了小说家用小说世界来反映现实世界的特殊意义。

收稿日期:2012-12-17

作者简介:钱旭初(1962-),男,江苏常州人,江苏广播电视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祛魅及其意义的弥合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学创作和思维开始了转型。其特点是文学场域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侧重娱乐、消遣功能的世俗化通俗小说创作经过一番艰苦的挣扎之后,登堂入室,并且这种倾向越演越盛,渐渐成为作家们的一种叙事策略。“通俗文学知识类型能够合法入场,首先得益于‘双百’方针以及‘二为’方向文艺政策调整并坚决贯彻执行”^{[1]191}。“同时,由于知识分子精英身份的觉醒,在‘伤痕’、‘反思’文学等社会批判创作的轰动效应过后,文学创作表现出一种以借鉴西方‘现代派’技巧为时髦、致力于文学‘专业’化方向的趋势,导致文学创作与普通群众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也为通俗文学创作的兴起提供了契机。文化资源上的二元:民间文学与外来文学,以及创作上的二元:‘严肃文学’、‘高雅文学’与‘大众文学’、‘通俗文学’,构成了新时期文学场域中认识‘通俗文学’的两个基本坐标轴”^{[1]195}。

通俗文学的出现和文学的“祛魅”有着紧密的关系。文学的“祛魅”,从新时期开始对创作理念政治化附着物卸去的祛魅开始,到王朔“文学算个屁”式的去崇高和神圣,到放弃先锋文学精神“能指的狂欢”、“小说即叙事”而构建的叙事霸权祛魅,文学创作作为特定的“知识形态”,其社会实践在文化市场化之后,依据资本运行的规律和新的文学生产机制进行生产,通俗小说以轻松、快感的阅读趣味为主的审美取向,事实上深刻地影响着作家的创作。通俗化越来越成为创作趋势。即便是思想严肃、立意深刻的小说创作,也通过采用通俗化的笔法来作为运作知识场的有效手段之一。

陶东风在《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中谈到,“按照后现代主义的看法,我们今天所处的正是叙事无所不在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叙述的社会”^[3]。这样一来,我们习惯上所说的“文学场”和“社会场”在“叙事”的意义上就成了同义语。这种情形之下,文学叙事便扩展为社会叙事。相反,原本并不能进入作家法眼的社会生活碎片,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学叙事的

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的扩散”的结果使文学失去了所谓精英的“纯”化,又在“俗”化的过程中使审美边界不断向外延伸并获得了文学日常化的合法权力。相对于宏大叙事和启蒙意义的纯文学创作而言,通俗文学更注重展示人生的场面,题材和世俗化、趣味的世俗化,文学表现的边界不断伸展,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琐碎、平凡、零星的生活事件在戏剧化改造后都进入了创作范畴,它们往往是在横向上演绎铺叙,一般不关注人性深度的表现,日常化和娱乐性要求也往往制约了创作的纵向开掘。这样在审美形态上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维度,甚至成为一些批评家诟病通俗文学的理由。

作为具有“自主性、创造性、批判性”特征的精英知识分子在普遍的“祛魅”之后,文学创作策略中添加了许多商业性的元素,以充分考量消费者、接受者的审美需求,充分满足读者的消费欲望。知识分子(精英)大众化的结果,是文化市场商业化、消费化的使然,而此时带来的深刻的危机是知识分子对公共领域的放弃、对精神关注的萎靡,消费热情的高涨,掩盖了他们对政治冷漠的颓败相。大众市场/文学创作的二元对立,既支配作者创作的“趋俗”、取悦于读者的倾向,又支配着作品中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性格乃至人性的世俗走向。

问题是怎样在市场法则和灵魂剖析之间、在大众化形式之下去寻找表达深度意义的可能性,在深刻的思考与愉悦法则的双峰之间,寻找一个得以勘探的深井,去窥视灵魂的挣扎。于是,意义的弥合,即知识分子如何重新收拾起独立、责任、社会良心和批判精神的传统,并在日常化叙事的过程中,探寻世俗的真相,构建一种既能满足大众娱乐、快感,又能启迪人们心灵的良知文学。这是一种精神和知识的弥合,是知识分子(作家)与文学(小说)的神圣感越来越趋于日常生活化与大众化时,将文学叙事的通俗笔法与作家精英立场之间的对立,转化为依存和共赢的艺术创造,这是人生与人性、横向展示和纵向开掘的双重对立和统一。这才是这个时代小说家们既顺应文化市场需求,又保持独立自我的知识分子思考的唯一出路和优化的叙事路径。

二、祛魅后的作家(知识分子)自觉

张欣的长篇新作《不在梅边在柳边》^[4]采用通俗化的笔法来揭示她认知的现实世界逻辑体系,表现了她对于现实困境、对于知识分子精神危机、对于孤独、隐忍、残酷等生命状态的态度。这确实是一个沉重而严峻的话题。我们将其称之为“祛魅后的作家(知识分子)自觉”。

其实,张欣的小说在通俗化这一点上做得很彻底。在小说中,她给我们叙述了一则“爱情加谋杀”、“悬疑加推理”、“复仇加惊艳”的故事。这些故事不折不扣成为了通俗小说类型的基本元素。而且张欣在平面线性横向叙述的同时,还将叙述线索纵向延伸,使故事成为一个反复叠加的复杂结构。

从“情爱”元素缘起,树仁大学著名物理教授蒲刃年轻时与柳乔乔相爱,却因柳父以其性格缺陷为由而阻止。之后柳乔乔嫁给蒲刃好友冯渊雷(后改行整形外科),构成了第一组三角恋爱关系;而冯渊雷虽然之后成为首屈一指的整形科大夫,但由于妻子内心依然怀恋蒲刃,而满怀妒意,与前来整容的各色女子随心所欲地上床,并写下“充斥着直白露骨的描写,随处可以见到勃起、高潮、紧实、弹性十足、水嫩的肌肤、欲仙欲死等字眼”的香艳日记,其中包括与松崎双电董事长儿子贺武平的妻子梅金的婚外情事。这构成了第二组婚外情关系。作者由此延伸出“谋杀”元素:贺武平发现梅金与冯的婚外性事(以及妻子当年读大学期间做陪酒女的身世和隆胸照片),谋杀冯渊雷;再引出“悬疑、推理”元素:冯渊雷预感不测,死前写信给蒲刃,指出贺武平是杀自己的凶手。蒲刃调查冯渊雷死因,寻找证据;而梅金为了阻止此事,利诱并调查蒲刃,发现蒲刃因为童年饱受父亲的暴虐,长大后为了复仇而给父亲服用慢性毒药的阴谋。最终推出“复仇”元素:蒲刃为冯渊雷复仇,将贺武平送进监狱;梅金向蒲刃摊牌,蒲刃无奈自杀;贺武平之父怪罪梅金,将其逐出家门……。

从叙事角度来说,作者将人物关系和命运做了极致化的处理,是符合通俗小说创作策略的。

小说写得波澜起伏、风声迭起,其离奇香艳足以吸引读者眼球。再加上多种时尚小说元素,诸如美洲豹夜总会的惊艳迷离、三亚湾的恬静风情,还有音乐会、郊游、黑社会、隆胸、以及教授、妓女、妈妈桑、富二代、暗探……一段段现代都市生活情状,如此丰富的题材资源,足以做出一桌奢华的饕餮大餐。

当然,让我们欣喜的是张欣的叙事态度,她在运用通俗故事言说方式的同时,拒绝了通俗小说的平面性言说,虽然不是精英知识分子那种激烈的启蒙和宏大叙事立场,但每一则繁华与动人的故事背后,都显然隐藏着作者严肃、严厉地审视人性的眼光。她成功地获取了通俗、精神两者衔接的有效途径,利用通俗元素而表现出了极其深刻的精神叙事。

首先,张欣通过一个通俗元素叠加的故事,为我们揭开了故事背后沉重的帷幕。一般的通俗小说叙事,往往停留在“人生/生存”层面,生老病死、吃喝拉撒,即便是爱情,或许是懒得离婚,即便是侦探,或许是叙述圈套,侧重关心大众的阅读愉悦。而《不在梅边在柳边》则在世俗寻找中指向了人生往何处安放的终极关怀,指向了人性最隐秘的深处。小说中描写的爱情是沉重而残忍的,无论蒲刃和冯渊雷与柳乔乔之间的错位,还是梅金和冯渊雷、贺武平之间无爱与性乱,都有理由指向生存的无奈。这种无奈与错位,最终导致了人生中所有美丽的面纱被撕扯得彻底,一场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从小说阅读的角度看,写出悲剧的本身,就通俗小说而言已经达到了叙事目标,而探寻悲剧的动因又使得小说叙事从平面走向纵深。不难发现,导致悲剧的动因是“欲望”。蒲刃希望重获爱情和友情,同时也隐含着复仇的欲望;梅金对于稳占在松崎双电名誉和地位的欲望;冯渊雷纵欲背后那难以满足的爱情欲望;贺武平报复、杀人背后的对于隐瞒丑闻的欲望……所有人物之间的这样一系列“欲望叙事”,不正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对于名誉、地位、金钱、情感、面子……的“欲望叙事”?然而,这欲望更是在错位、无奈、挣扎的身后,又牵扯着更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蒲刃和梅金都来自贫困和落后的偏远山区,由于

贫困而导致了父子、父女、父兄、兄妹、夫妻之间亲情的沦丧,导致了精神的缺失,导致了灵魂的漂泊,也渐渐养成了他们偏执的个性。可以说是“贫困”导致了无处安放的畸形灵魂,制造了这样一出人间悲剧。

其次,当我们抓住小说中极具通俗品味的“侦探”元素看,侦探故事的背后是一套“复仇”叙事的话语体系。借助于这个侦探的过程,一切隐藏在故事背后的人际关系:背叛、复仇与掠夺都昭示天下。张欣在小说中,有意无意之间写了金梅和柳乔乔对于婚姻的背叛,无论前者是身体上的、后者是内心中的,这种背叛不能简单看成是导致了贺武平和冯渊雷以及蒲刃复仇的女性“原罪”。在另一个角度看,金梅的身体背叛(纹身及婚外性),缘自她渴望同自己过去贫困背景的脱胎换骨与贺武平无爱的困境宣泄;柳乔乔内心的背叛,缘自其父不满蒲刃从小养成的性格缺陷而否婚而带来的怀念。因而背叛的动因依然是贫困结出的苦果。于是,复仇和背叛一样,也成为了超越文学传奇意义的社会场域的苦果。贺武平对冯渊雷,梅金对贺武平,冯渊雷对柳乔乔,蒲刃对贺武平,梅金对蒲刃,蒲刃对于父亲……生的复仇,性的复仇,情感的复仇,欲望的复仇,环环相扣的复仇。我们更愿意将其看成是复仇寓言,因为在复仇的背后,隐喻着这个社会网络阴影下的生活。这里的“复仇叙事”和“掠夺叙事”成为一种同构。梅金因身世暴露、丈夫杀人和邦德公司敲诈,面临自己地位的被剥夺,尽管采用一切手段,最后依旧被无情抛弃;冯渊雷夺人所爱但依旧心理失衡,终日周旋在乱性的挣扎中,最终被谋杀;蒲刃童年时被父亲夺走了母爱和亲情,之后采用极端手段剥夺父亲晚年的幸福甚至生命,结果自己也被迫被剥夺了生的权利……相互之间生命的掠夺、性的掠夺、情感的掠夺、地位的掠夺和欲望的掠夺……谁都没有逃脱出鲁迅当年在《狂人日记》中所揭示的“吃与被吃”的食物链。

至此,我们绝对不会再津津乐道张欣小说通俗叙事的阅读快感与故事的奇妙了,而是掩卷沉思,被其中沉重的人性悲哀而深深打动,甚至难以自拔。祛魅以后的知识分子,不再是居高临下地进行精英化写作了,知识分子的实践性在通俗

笔法与意义深度之间寻找到了弥合,这是一种基于新文化场域与文化立场视野下的人民性写作,也缓和了以往知识分子精英写作和通俗写作之间的话语霸权纷争。

三、知识分子死亡与身份危机

当下社会,知识分子的世俗化倾向愈演愈烈,他们往往真正关心的是地位、金钱、住房、美女,知识成为他们满足上述欲望的工具和途径。宏大叙事的拒绝、启蒙精神的拒绝、精英立场的拒绝,他们越来越自主地将自己放置到和普通平民等量的位置上。知识分子神话破灭,作为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已经死亡。

这是极其悲哀的一个判断。但即便从文学作品,我们确实已经无法找寻到知识分子昂扬的形象了。就像《不在梅边在柳边》里的蒲刃,“有时候会为自己卑微的出身为荣,对于所谓知识阶层的虚伪和做作充满痛恨和不屑”^{[3]205}。作为树仁大学的著名教授,蒲刃聪明而多能,执著而智慧,浪漫而富有……但在小说中更多看到的蒲刃却是另一个景状:一个被光环笼罩着的杀人者,自比“沉香”救母而杀父,基本动机缘自丧母失姐的情感复仇;他着手调差冯渊雷死因,出于情感的补偿;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他始终生活在一种非理性的世界里,陶醉在欲望的支配下,停留在知识功能层次上。作为物理学教授,他能听懂霍金的“弦论”,但面对诸如玻璃奇异的开裂、盆栽无故的死亡等现象,却只能以不祥之兆来解释;全篇小说涉及到他知识分子身份相关的只有寥寥几处:“从实验室出来……”、“到图书馆借书”、“课堂上关闭手机”、“给学生号脉治病”、“写科普读物”,而这些描写只是为了满足于情节发展的需要,对于蒲刃作为知识分子身份的描写并无实质性意义。相反,他是一个出没夜店,一夜情,三亚湾浪漫,挥金如土……的世俗化了的大学教授,他的侦探、他的复仇、他的爱与恨、他的所有作为,只是出于情感需要和欲望指使,并非理性选择。因此所谓公平、正义、人道、宽容、自由等等字眼,并不在他的字典里。这是个被解构了知识分子身份的知识分子,是处于世

俗困境和文化困境中的知识分子。蒲刃完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自我的碎片化。

小说的题目“不在梅边在柳边”取自昆曲《牡丹亭》的曲词,但与原作中所描写的梅、柳之情并无关系。实际上这是叙述者让蒲刃做了一道或“梅(梅金)”或“柳(乔乔)”的选择题。对于蒲刃而言,这实际上是他面临的两条路的选择,两种人生方式的选择。选择梅(金),则标志着他同意梅金要他放弃查询冯渊雷死因真相的要求;而选择柳(乔乔),却是蒲刃内心渴望的意愿,意味着他希望回归当年的纯真,甚至满足对冯渊雷、柳父等当年被抢夺走他爱情、友情报复的欲望。事实上,蒲刃没有选择梅,这不是他的清高和正义,而是他执拗的性格使然;他最终也失去了柳,心底的欲望最终还是无法兑现。不愿靠梅、无缘投柳,这是一道两难的选择题。就蒲刃和梅金而言,本质上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是寒门之子,款曲相同”的出生;“饱受贫困,生长在财富和特权之外,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自己的头脑;都是百忍成金,打拼出自己的那一片天地”的奋斗史;都“没有发自内心的快乐;都是把心拿出来装在一个盒子里,放在书橱的最高一层,看都不要看一眼”^{[3]207}的情感苦痛。他们之间的较量,本质上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欲望。就像梅金对蒲刃所说的“谁都不是正义的化身,而且这个世界没有是非,只有立场”^{[3]182}。于是,没有了“立场”的蒲刃,没有了现代知识分子科学精神和理性意识的知识分子蒲刃,经历着巨大的精神危机,死就成为了他必然的归宿。这个“选择”的意义在于归属感的难以实现。然而,蒲刃以及梅金,他们都失去了家庭的归属,失去了亲情的归属,失去了地位的归属,也失去了情爱以及安全的归

属。他们在这个人生的选择中被撕裂了,被无以救赎的罪恶毁灭了。

最具戏剧性表现的情节,是小说最终写主人公的死亡。蒲刃之死,代表着他所有欲望最终的破碎,他既无法像夜总会妈妈桑小豹姐那样看透人生,临死也没有参透小豹姐对他说的“为什么一个物理学家就不能爱钱呢?把自己当普通人吧,这样至少不纠结”,“更重要的是好好活着,不要问它有什么意义,没什么意义,我们都是苟且偷生的人”,“完美真的很无趣,而且毫无意义。”那些世俗箴言;也无法像贺武平那样彻底潇洒地玩弄生活,身份、地位乃至性格,使他悬浮在半空中,无法真正落地成一个凡人。在与梅金的博弈中,他输得彻底,连老底都让人给端了。一个对于死亡案例追踪的大学教授,本身也是一个杀人犯,其知识与能力,被他用来制造了另一场深谋远虑的谋杀。当真相暴露后,只能以一种伪善的方式,结束了自己与父亲的生命,也结束了自己的罪恶。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作者对于主人公文化身份与道德形象的撕裂。

小说中写到蒲刃死后,学生们的深切怀念和高度评价,蒙蔽之中的人们塑造着蒲刃的道德形象,也许这是永远不知道真相的学生们对老师的“护魅”,但从作者这有意无意的一笔看其立场,这“护魅”的举动,恰恰反映出了她对人性裂变的哀叹。一个以科学探究为本的知识场中,永远存在着不明真相的“暗处”,完善一个道貌岸然的大学教授形象,却摧毁了一个更是道貌岸然的大学形象,“限知”叙事的出现,颠覆了整个知识场,在一场个人英雄虚伪的谢幕之后,整个知识场的神庙也一并坍塌了。

参 考 文 献

- [1]初清华.新时期文学场域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 [2]陶东风.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5.
- [3]张欣.不在梅边在柳边[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